

# 酒务头 M1 初论<sup>\*</sup>

李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填补了晋南地区殷墟文化晚期高规格遗存发现的空白,荣获 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酒务头墓地发现 5 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其中 4 座被盗,仅有 M1 保存完好并经科学发掘。酒务头 M1 的考古新发现,对于认识晋南地区殷墟文化晚期遗存的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为探讨晋南地区由商入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点。故此依据现已发表的材料<sup>[1]</sup>,谈一点对酒务头 M1 的初步认识。

## 一、酒务头 M1 的年代

酒务头 M1 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甗、簋、觚、爵、尊、卣、斝、鬯、盃、盘,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对象。其中又以铜甗、卣、斝、鬯、簋的时代特征最具代表性。

铜甗 M1 : 20 的甗部靠近甗腰处附加有一根自上而下的铜钩,用于安装能够上下活动的铜算。此件铜甗的甗钩似为先铸铸接,与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铜甗的铸造工艺<sup>[2]</sup>相同。类似的联算铜甗在殷墟文化中极为罕见,仅有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M303 : 57 与之相似,但后者以先铸接的铜半环安装铜算<sup>[3]</sup>,两者存在铸造工艺上的差异。殷墟大司空村出土铜甗 94ASM7 : 22<sup>[4]</sup>虽有铜算,但为可摘取式。此外,殷墟榕树湾小区出土铜甗 M1 : 7 “甗与鬲中间原有算,已残”<sup>[5]</sup>,具体情况不详。上述三件铜甗的年代均为殷墟文化第四期。

大铜卣 M1 : 63、小铜卣 M1 : 62 的器盖和口下纹饰带内填由小型雷纹构成的几何形蚕纹,属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流行特征<sup>[6]</sup>。根据目前的资料,自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以降,开始流行大、小铜卣同出一墓的现象,特别是相同纹饰组合的大、小铜

---

<sup>\*</sup>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关中商代青铜礼器研究(批准号:19CKG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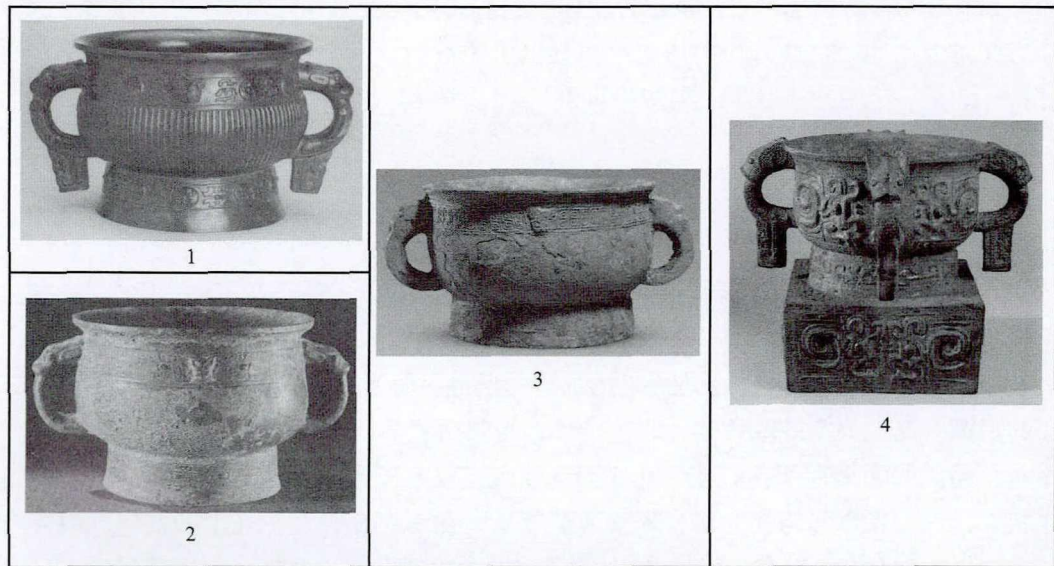
卣, 见于山西灵石旌介 M1<sup>[7]</sup>、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M303、刘家庄北 M1046<sup>[8]</sup> 等典型铜器墓, 酒务头 M1 的情况也是如此。

铜罍 M1 : 59 为分裆罍, 口上有双柱, 这是流行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特征, 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94ASM7 : 33、M303 : 108、刘家庄北 M1046 : 20 皆其例。

铜鬲 M1 : 85 双耳衔环, 圈足斜高, 同样属于流行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特征, 如大司空村 M303 : 59。

需要重点讨论的是铜簋 M1 : 84 的时代特征。

首先来看具有明确铭文者。戊辰彝(肆簋)(图一, 1)<sup>[9]</sup> 和殷墟西区铜簋 M1713 : 33(寝鱼簋)(图一, 2)<sup>[10]</sup> 均为商末器。上述两器的标志性时代特征是大弧度束颈、鼓腹较显著。天亡簋被认为是武王灭商之后所铸<sup>[11]</sup>, 簋身的主要变化特征是束颈和鼓腹程度皆不如前。酒务头 M1 : 84(图一, 3) 簋身的束颈和鼓腹特征更接近西周初年的天亡簋(图一, 4), 可能属于相比肆簋和寝鱼簋年代更晚的商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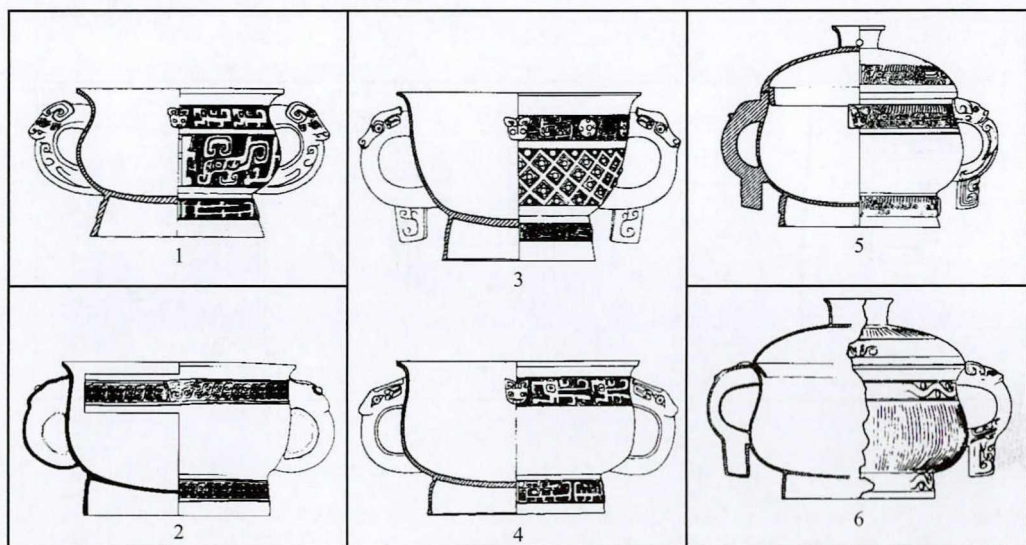


图一 商周之际铜簋对比

1. 戊辰彝(肆簋) 2. 殷墟西区 M1713 : 33(寝鱼簋) 3. 酒务头 M1 : 84 4. 天亡簋

其次来看商系铜器群中铜簋的演进序列。在安阳殷墟遗址的铜器墓序列中, 与肆簋、寝鱼簋形制特征最为相似的是大司空村墓葬出土的两件铜簋 M303 : 79(图二, 1)、M303 : 81, 束颈和鼓腹程度显著, 环耳上接于口下纹饰带处。相对年代更晚的刘家庄北 M1046 所出束颈鼓腹簋 M1046 : 61(图二, 4) 的束颈和鼓腹程度皆不如前, 圈足也趋于矮直, 酒务头 M1 : 84(图二, 2) 的特征与之近似。该墓同出盆形簋

M1046 : 60 (图二, 3) 的圈足外斜角度减小, 环耳与口下纹饰相接处更加靠上, 具有相对较晚的时代特征。山东滕州前掌大 M11<sup>[12]</sup> 和河南鹿邑太清宫 M1<sup>[13]</sup> 属于相对年代更晚的商系文化墓葬, 发掘者均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早期, 两墓随葬铜簋 (图二, 5、6) 的圈足较为矮直, 双环耳与口下纹饰向上靠近口唇或直接与口唇处相接, 属于相对更晚的时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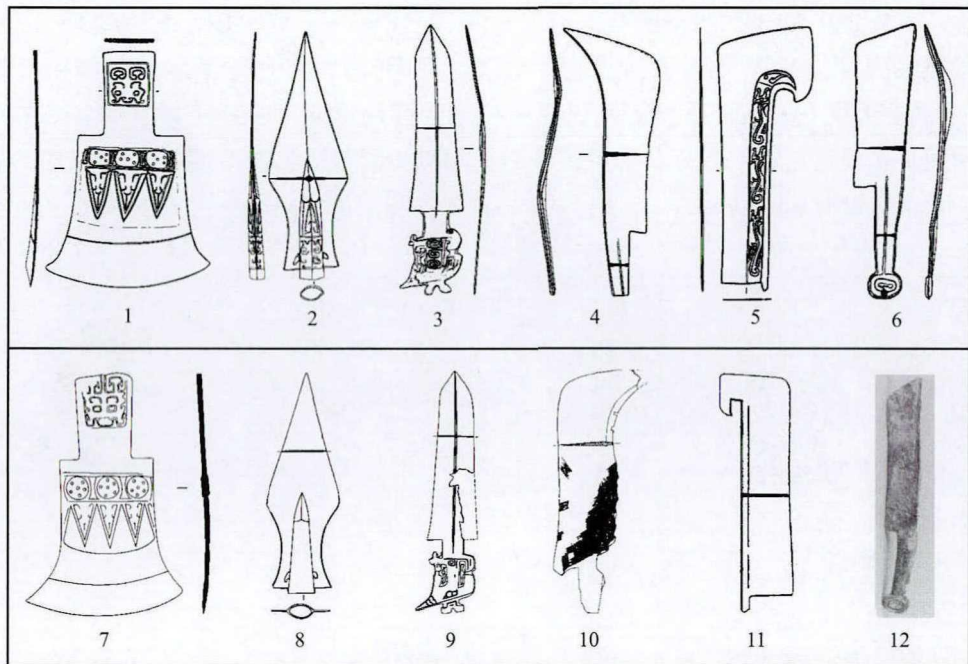


图二 商系铜器群铜簋对比

1. 大司空村 M303 : 79 2. 酒务头 M1 : 84 3. 刘家庄北 M1046 : 60 4. 刘家庄北 M1046 : 61  
5. 前掌大 M11 : 79 6. 太清宫 M1 : 158

酒务头 M1 所出铜钺、矛、曲内戈、翘刃刀、卷刃刀和环手削等也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铜钺 M1 : 43 (图三, 1) (M4 : 23 为同款) 与安阳殷墟榕树湾 M1 : 25 (图三, 7)、郭庄村北 M6 : 8 相似, 铜矛 M1 : 44、M1 : 45 (图三, 2) 与刘家庄北 M1046 : 124 (图三, 8) 相似, 曲内戈 M1 : 38、M1 : 40、M1 : 41、M1 : 23、M1 : 24 (图三, 3) 与刘家庄北 M1046 : 78、M1046 : 150 (图三, 9) 相似, 翘刃刀 M1 : 31 (图三, 4) 与刘家庄北 M1046 : 97 (图三, 10) 相似, 卷刃刀 M1 : 50 (图三, 5) 与郭庄村北 M6 : 6 (图三, 11) 相似。此外, 环手削 M1 : 37 (图三, 6) 也与榕树湾 M1 : 33 (图三, 12) 相似。

由此可见, 在殷墟文化的铜器墓序列中, 酒务头 M1 的年代既不是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早的铜器墓, 也不是该期最晚的铜器墓, 其相对年代晚于大司空村 M303, 与刘家庄北 M1046、榕树湾 M1、郭庄村北 M6 的年代大体相当或略早。



图三 酒务头与殷墟出土青铜兵器及工具对比

1、7. 钺(酒务头 M1 : 43、榕树湾 M1 : 25) 2、8. 矛(酒务头 M1 : 45、刘家庄北 M1046 : 124) 3、9. 戈(酒务头 M1 : 24、刘家庄北 M1046 : 150) 4、10. 翘刃刀(酒务头 M1 : 31、刘家庄北 M1046 : 97) 5、11. 卷刃刀(酒务头 M1 : 50、郭庄村北 M6 : 6) 6、12. 环手削(酒务头 M1 : 37、榕树湾 M1 : 33)

## 二、酒务头 M1 与殷墟文化典型铜器墓的对比

通过与安阳殷墟遗址同时期殷墟文化铜器墓的对比, 可对酒务头 M1 的地方特点和个体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 (一) 墓位形态

发掘者认为酒务头基地的主体是殷墟文化第四期, 5 座大墓的相对年代顺序排列为由西至东<sup>[14]</sup>, 这意味着酒务头 M1 应是该基地年代最晚的大墓。

以大型墓葬相聚分布的墓群亦曾见于安阳殷墟遗址。在殷墟西区第三墓区的西北部, 发现 M689、M699、M700、M701 四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集中分布在一起, 形成一处小型墓群<sup>[15]</sup>。这四座墓葬的墓道皆朝南略偏西, 其中 M689、M699、M700 由西向东排列分布, M701 的墓圻位于 M699、M700 墓道之间并打破前者的墓道(图四, 1)。M699 随葬 VII 式陶觚、VII 式陶爵和 IV 式陶盘, M700 随葬 VIII 式陶觚、VI 式陶盘, 可知后者的年代也晚于前者。四座大墓虽均被严重盗扰, 但根据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判断均为殷墟文化第四期。由此可见, 酒务头基地大墓与殷墟西区第三墓区大墓的墓位

形态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似之处。

发掘者还指出,酒务头墓地的五座大墓的西部或西南部均发现与之相对应的车马坑(图四,2)<sup>[16]</sup>。以往,考古工作者“根据殷墟西区的埋葬情况推测,大墓一般在车马坑的东或东北方”<sup>[17]</sup>。相关研究也认为,殷墟遗址拥有独立陪葬车马坑的墓葬“车马坑均设置于诸墓的西南方向,陪葬的车马坑群都为横向排列”<sup>[18]</sup>。酒务头M1的墓主东向,墓葬西南对应的车马坑K1的马车也是朝向东,符合以往对于殷墟文化大墓与其对应车马坑位置的规律性认识。

从墓葬及其对应的车马坑分布情况看,酒务头墓地属于较为典型的殷墟文化墓地。

## (二) 墓葬形制

通常情况下,商周时期的带墓道大墓如果只有一条墓道,墓道往往开在墓主头向相反的墓圻宽边上。酒务头大墓尽管均为南向墓道,但墓圻为东西向长方形,墓道开在了墓圻的长边上。这样的墓葬形制在殷墟文化中较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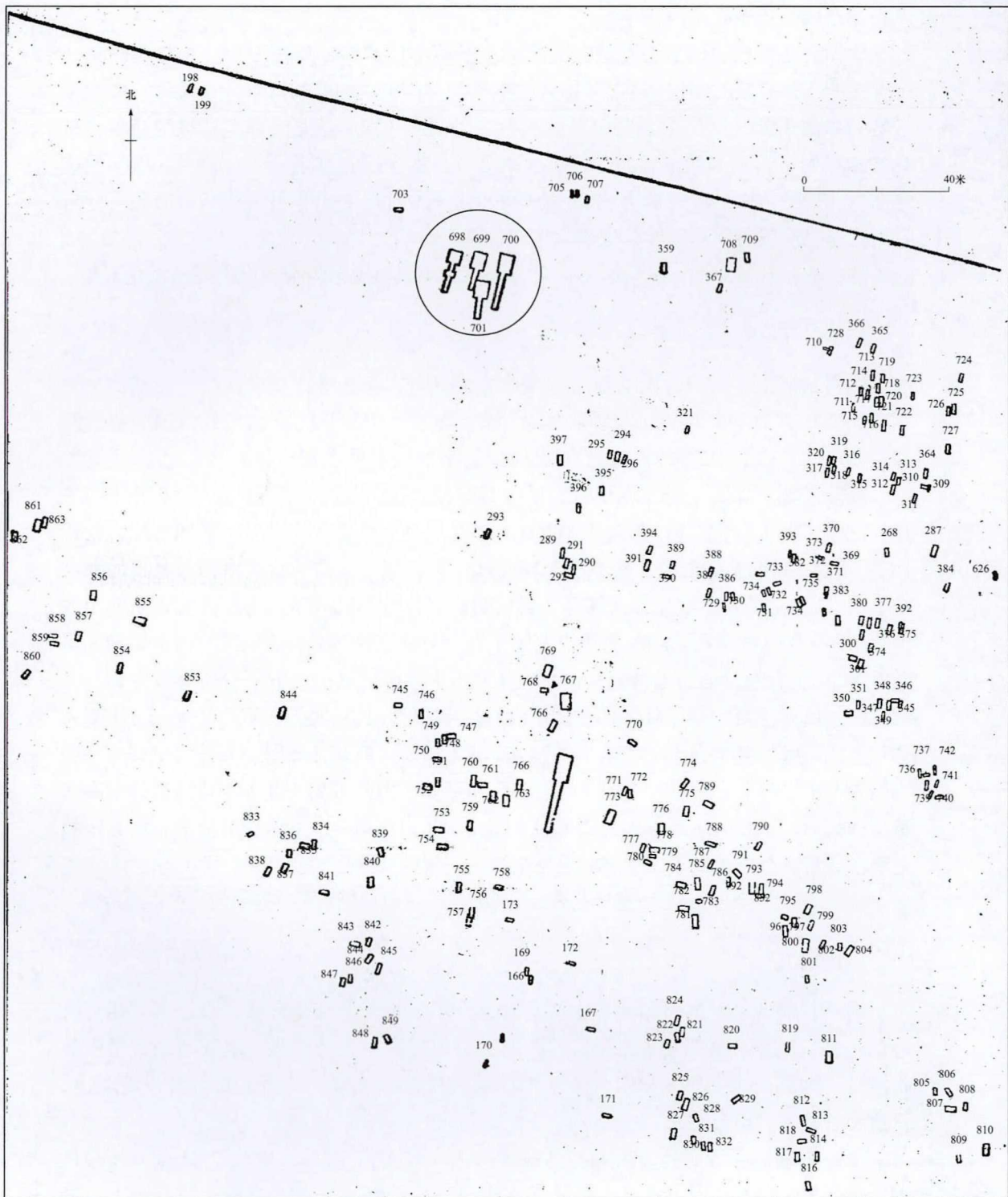
安阳殷墟的郭家庄曾发现相同形制的墓葬M172,与著名的郭家庄M160处于同一墓群之中(图五,1)<sup>[19]</sup>。郭家庄M160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发现10件铜方觚和铜角的组合,相当于十套铜觚、爵的墓葬,是一座规格相当之高的铜器墓。M172被盗严重,根据出土陶觚、爵的时代特征判断墓葬年代为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偏早阶段,与大司空村M303的年代大体相当,但该墓底部的长、宽尺寸明显大于大司空村M303,且有墓道,应该比同时期的大司空村M303墓主马危的身份等级更高(图五,2)。值得注意的是,M160同样是一座东向墓葬,其墓底长、宽尺寸也与M172大体相当,最大的差别在于年代略早的M160缺乏墓道。两墓处于同一墓群之中,该墓群内的M163、M165、M168、M169也是东西向墓葬。由此可见,此类东西向墓葬带南向墓道的大墓,主要是墓葬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墓道方向并未受其影响,而是依然选取了通常流行的南墓道。这实际上是东西向高规格墓葬添加墓道的一种方式。

由于酒务头墓地发现的大墓皆是东西向的南墓道大墓,仍然可将其视为一种本地特色。

## (三) 葬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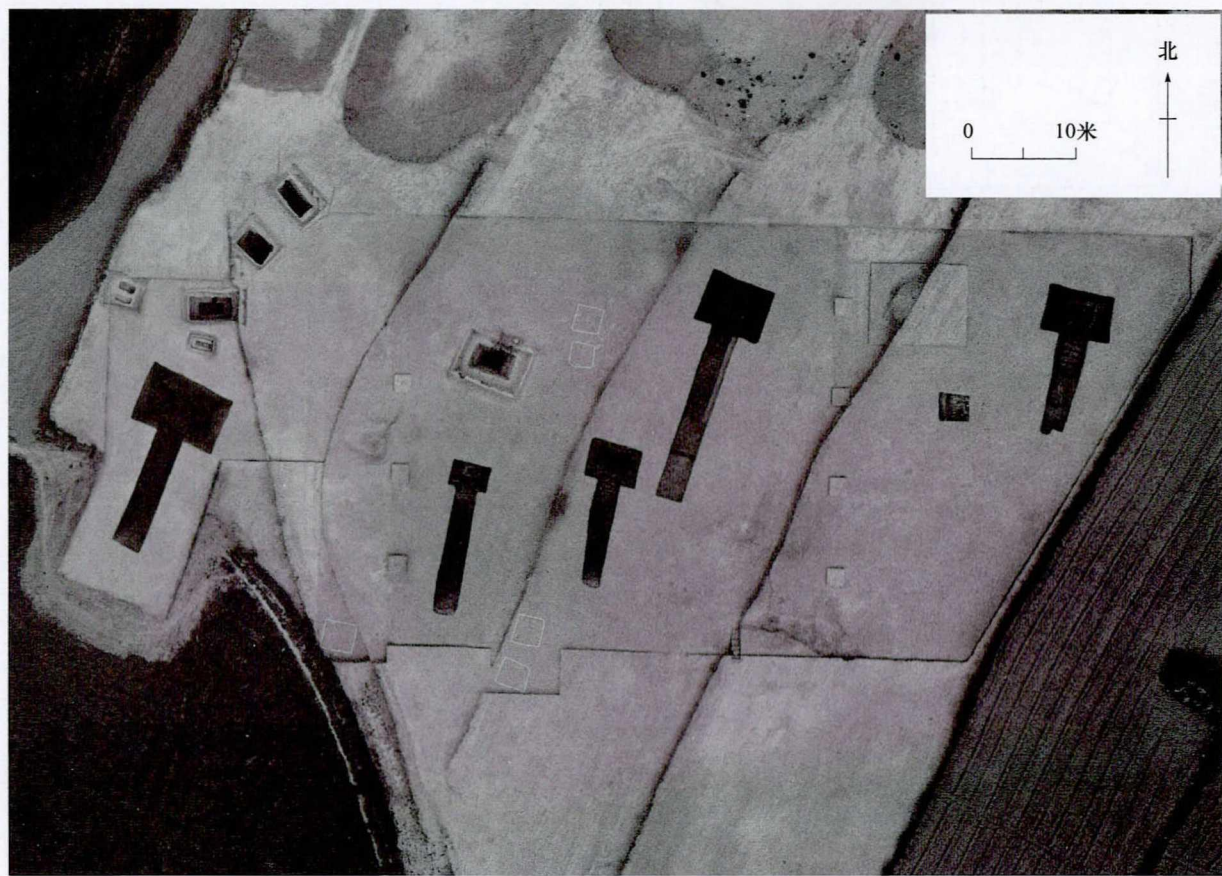
殉人在殷墟文化的贵族墓葬中非常常见,不论是大型带墓道墓,或是墓圻相对狭小的小型贵族墓。直至商周之际,沔西地区新出现的一类随葬联裆鬲或高领袋足鬲的腰坑墓,如张家坡67SCCM54、M89<sup>[20]</sup>,客省庄83SCKM1<sup>[21]</sup>等,尽管并没有墓道,仍然频繁发现二层台殉人。

酒务头墓地也是如此,在M2、M3、M5中均发现了殉人,尤以“M5殉人痕迹最多,发现6~7处”<sup>[22]</sup>。然而奇怪的是,未经盗扰的酒务头M1中竟然没有殉人,这是很特殊的情况。从墓地的整体情况看,酒务头M1缺乏殉人并不能看作是地方特点,而应属于个体特点。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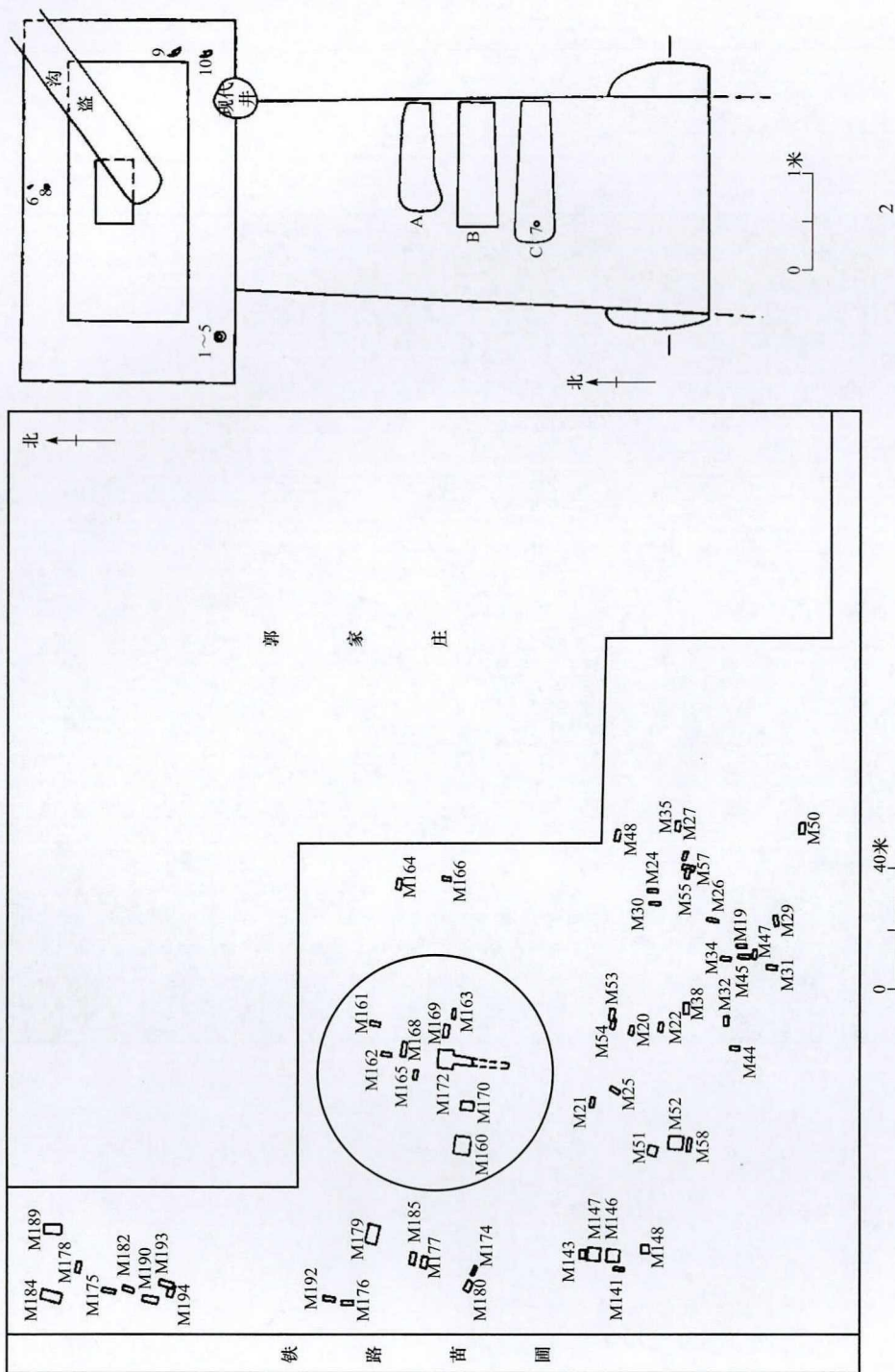
图四 殷墟西区第三墓(西区)  
1. 殷墟西区第三墓区(西区)平面图



2

与酒务头墓地平面图

2. 酒务头墓地平面图



图五 郭家庄北区墓葬平面图及 M172 平、剖面图

1. 郭家庄北区墓葬平面图 2. M172 平、剖面图



#### (四) 随葬青铜礼器

安阳殷墟遗址的殷墟文化晚期铜器墓通常埋入一套用于下葬的铜器，具有较为一致的铭文信息。从酒务头 M1 随葬青铜礼器和兵器的整体情况看，也属一套用于随葬的青铜器。除铜爵的铭文明显不同外，其余青铜器的铭文信息也基本一致。可见，酒务头 M1 铜器群与安阳殷墟同时期墓葬铜器群的特征类似。

通过安阳殷墟大司空村 M303 与刘家庄北 M1046 随葬青铜礼容器组合的对比（表一），酒务头 M1 具有一套较为典型的殷墟文化铜器墓礼容器组合。尽管酒务头 M1 在墓葬形制方面属于规格更高的带墓道墓，其随葬组合的器类丰富程度却不及安阳殷墟同时期的大型竖穴土坑墓。

表一 随葬青铜礼容器组合对比

	大圆鼎	中圆鼎	小方鼎	分档鼎	扁足鼎	甗	簋	觚	爵	角	解	平档罍	分档罍	折肩尊	觚形尊	卣	壶	罍	方彝	盃	盘	斗
大司空村 M303	1		2	2	2	1	2	6	10			1	1	1	1	2	1	1		1	1	1
酒务头 M1	1			2		1	1	5	6				1		1	2		1		1	1	
刘家庄北 M1046	1	1	2	2		1	2	3	5	2	2		1	2	1	2	1	1	1	1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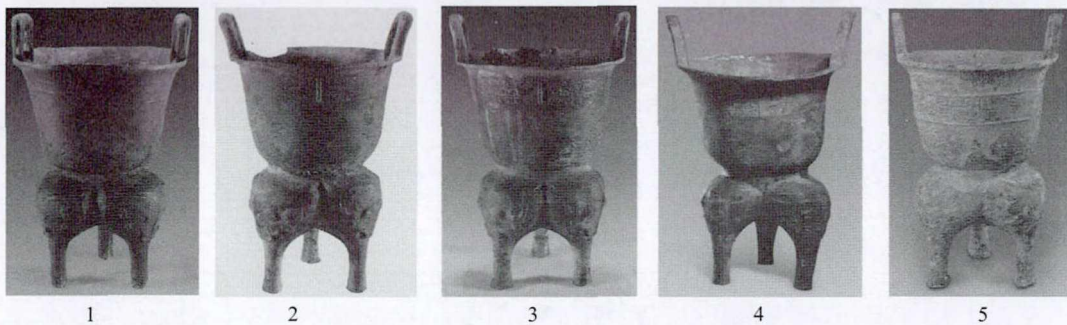
殷墟文化晚期的墓葬除大圆鼎外，还会随葬小方鼎、分档鼎、扁足鼎等陪鼎，如大司空村 M303 和刘家庄北 M1046 均随葬两套这样的陪鼎。从铜觚、爵的套数考量，酒务头 M1 尽管低于大司空村 M303，但高于刘家庄北 M1046，该墓随葬的陪鼎却仅有两件分档鼎，其样式也不是殷墟文化晚期流行的大兽面纹分档鼎，而是仅在口下饰一道条带状兽面纹，这是铸造工艺上的简化特征。

从公安追缴的出自酒务头基地的“子匿”组铜器看，这应是出自另一座大墓，计大圆鼎 1 件、小方鼎 2 件、分档鼎 1 件（应有 2 件）、觚 2 件（还应有与之对应的爵）。这显然不是铜器群的全貌，但至少属于与大司空村 M303 铜器群面貌接近的礼容器组合。“子匿”组铜器的大圆鼎铸造精良，通耳高达 43.7 厘米，重达 13.57 千克，而酒务头 M1 随葬大圆鼎的通高仅有 25 厘米，重量也仅有 2.426 千克，两者差异悬殊。“子匿”组大圆鼎、小方鼎、分档鼎的铸造质量并不差于安阳殷墟铜器墓所出者。从这个角度上看，酒务头 M1 铜器群确实发生了“殷礼”基础上的简化现象。

简化现象同样反映在酒务头 M1 随葬的铜簋之上。参照同时期铜器墓的情况，酒务头 M1 应当随葬 2 件铜簋。酒务头 M1 随葬的铜簋选取了流行年代较早、细节相对简单的卷云纹作为口下和圈足的主体纹饰，反映的也是铸造工艺上的简化。

简化现象还体现在酒务头 M1 随葬的铜甗之上。自殷墟文化第三、四期之际以降，

殷墟文化高规格铜器墓的铜甗流行绲索耳,如郭家庄 M160:51(图六,1)、大司空村 M303:57(图六,2)、刘家庄北 M1046:4(图六,3)等。酒务头 M1:20(图六,4)为新兴的联算甗,基本形制特征也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铜甗相近,但主要差异体现在口上的双耳并未采用绲索耳,而是传统立耳。这同样是铸造工艺简化的表现之一,类似的情况在安阳殷墟的年代相近及略晚的铜器墓中也有所体现,如榕树湾 M1<sup>[23]</sup>随葬铜甗(图六,5)口下纹饰为简化为轮廓的波浪形夔纹,口上同样是传统立耳。至于殷墟西区 M1713<sup>[24]</sup>、郭家庄北 M6<sup>[25]</sup>、刘家庄北 M9<sup>[26]</sup>等明器化铜礼器墓,随葬铜甗也采用了传统立耳。



图六 铜甗对比

1. 郭家庄 M160:51 2. 大司空村 M303:57 3. 刘家庄北 M1046:4 4. 酒务头 M1:20 5. 榕树湾 M1:7

酒务头 M1 随葬的 5 件铜甗采用了单层花纹的粗体甗。相对而言,粗体甗往往与单层花纹配套出现,皆是早年流行的作风,这也属于铸造工艺的简化现象。

随葬成组铜饅也是殷墟文化贵族墓葬的重要标配。前涉郭家庄 M160、大司空村 M303、殷墟西区 M699 皆随葬一套 3 件铜饅组合。酒务头 M1 随葬一套 3 件饰水牛角兽面的铜饅组合,酒务头 M4 随葬另一套 3 件饰羊角兽面的铜饅组合。根据酒务头 M4 腰坑中所出陶鬲的时代特征可知其年代同属殷墟文化第四期。

从青铜礼器群的整体特征看,酒务头 M1 铜器群属于较为典型的殷墟文化墓葬青铜礼器群,但部分器类出现了铸造工艺上较为明显的简化特征,这并不能归之为酒务头墓地的整体特征,而仅能局限为酒务头 M1 此时此地的自身特征。

## (五) 随葬陶器

殷墟遗址的墓葬最常见的随葬器类是陶甗、爵,安阳地区周邻的磁县<sup>[27]</sup>、淇县<sup>[28]</sup>等地也曾发现随葬陶甗、爵的墓葬。除此之外,便是与安阳地区关系密切的山东青州苏埠屯<sup>[29]</sup>、济南刘家庄<sup>[30]</sup>存在随葬陶甗、爵的墓葬。据发掘者披露,酒务头 M5 “出土残陶爵”<sup>[31]</sup>,这一信息暗示酒务头墓地与安阳殷墟可能存在较为直接的文化联系。

陶甗是殷墟文化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器类,特别是在规格稍高的铜器墓中。但是殷墟

遗址的铜器墓随葬的陶鬲趋于多元化，可依据尺寸和特征分为大、中、小型陶鬲。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酒务头 M1 随葬陶器皆为小型陶鬲（图七，1）（其中 1 件尺寸更小的陶罐属于小型陶鬲的简化形式）。小型陶鬲是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的常见器型，但仅随葬多件小型陶鬲的墓葬也比较少见。在安阳殷墟遗址，榕树湾 M1 仅随葬小型陶鬲（图七，2）（另有陶簋发现于填土中），该墓的年代也与酒务头 M1 大体相当或略晚。



图七 酒务头 M1 与榕树湾 M1 随葬陶鬲

1. 酒务头 M1 随葬陶鬲 2. 榕树湾 M1 随葬陶鬲

从随葬陶器方面看，酒务头 M1 仅随葬小型陶鬲的情况尽管较为少见，但在安阳殷墟遗址仍然可以找到墓例。而就陶鬲本身而言，也与安阳殷墟遗址所出者难辨差别。

### 三、酒务头 M1 的发现意义

刘绪先生指出，商文化在殷墟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在西方处于“退缩”的状态，不论是晋南的汾河谷地、关中东部还是洛阳以西的豫西地区均罕见此阶段文化遗存<sup>[32]</sup>。酒务头 M1 与安阳殷墟遗址同时期铜器墓的共性特征是主要的，个性特征是次要的，可以认定为一座典型特征的殷墟文化铜器墓。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酒务头 M1 是晋

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典型的殷墟文化第四期铜器墓,也是目前确知位置最靠西的殷墟文化第四期铜器墓<sup>[33]</sup>。该墓的发现,确立了晋南地区殷墟文化第四期铜器墓的典型墓例,为探讨汾河谷地和关中地区同时期铜器群的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提供了关键的时空坐标。

酒务头 M1 青铜礼器群的整体面貌与安阳殷墟遗址同时期铜器墓非常近似,酒务头 M5 随葬陶爵的情况更是暗示其与安阳殷墟遗址非同寻常的直接联系。酒务头墓地的出现,是商王朝为巩固西部边陲而采取的重要举措,甚至有可能是殷墟文化晚期直接来自安阳商都的政治军事措施。

酒务头 M1 不论是器群构成或器物特征上均呈现出了趋于简化的特点,墓葬规格相当高却无殉人,随葬铜爵的铭文明显异于同出的其他铜器,这些特殊现象或许与接近商王朝覆亡的衰落大势有关。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自商王武乙之后,西土集团已能够在汾河谷地开展军事行动。《尚书·西伯戡黎》更是在帝辛时期将势力伸到了迫近安阳的太行山西麓。酒务头墓地处“戡黎”之路的关键位置,西土集团在东进过程中势必将其剪除。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务头 M1 也为考古视角探讨商周更替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的节点。

#### 注 释

- [1] 白曙璋、高振华:《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2018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编著,高振华、白曙璋、马昇主编:《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年;王春法主编:《河东之光——山西酒务头考古成果展》,山东美术出版社,2020 年。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5 年。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 年;金正耀:《商末至西周早期铜甗工艺的演变及其意义》,《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5]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04 页。
- [6] 李宏飞:《论周原贺家 73M1 铜器群——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一》,《南方文物》2017 年第 4 期。
-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 年。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 1046 号墓》,《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
- [9] 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 年石印本;郭沫若:《“戊辰彝”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 年;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中华书局,2019 年。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

年第8期。

- [1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 [1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 [14] 白曙璋:《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初识》,《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16] 白曙璋:《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初识》,《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0期。
- [18] 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沔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第9期。
- [22] 白曙璋:《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初识》,《山右吉金——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 [23]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11年。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 [25]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 [26]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2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淇县大李庄商代晚期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5期。
- [29]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 [30]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31] 白曙璋、高振华:《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年。
- [32] 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 [33] 陕西西安老牛坡发现的袁家崖墓葬以往被认为是一座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但其年代有可能晚至西周初年(参看雷光山:《西安袁家崖墓葬年代为西周说》,《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随葬器物还出现特征明显的关中西部文化因素,也并不具备殷墟文化的典型特征。